

中共抗战与
毛泽东崛起

烽火少年城

人民文学出版社



徐肖冰 摄影 李蒙 撰文



中共抗战与
毛泽东崛起

烽火边城

人民文学出版社



徐肖冰 摄影 李蒙 撰文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烽火边城:中共抗战与毛泽东崛起/徐肖冰摄影;李蒙撰文.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

ISBN 978-7-02-010932-6

I. ①烽… II. ①徐… ②李… III. ①中国共产党—党史—1937~1949
IV. ①D23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93837号

责任编辑 徐广琴

装帧设计 黄云香

责任印制 王景林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阳区内大街166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制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293千字

开 本 720毫米×1020毫米 1/16

印 张 24 插页3

印 数 1—10000

版 次 2016年4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16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0932-6

定 价 39.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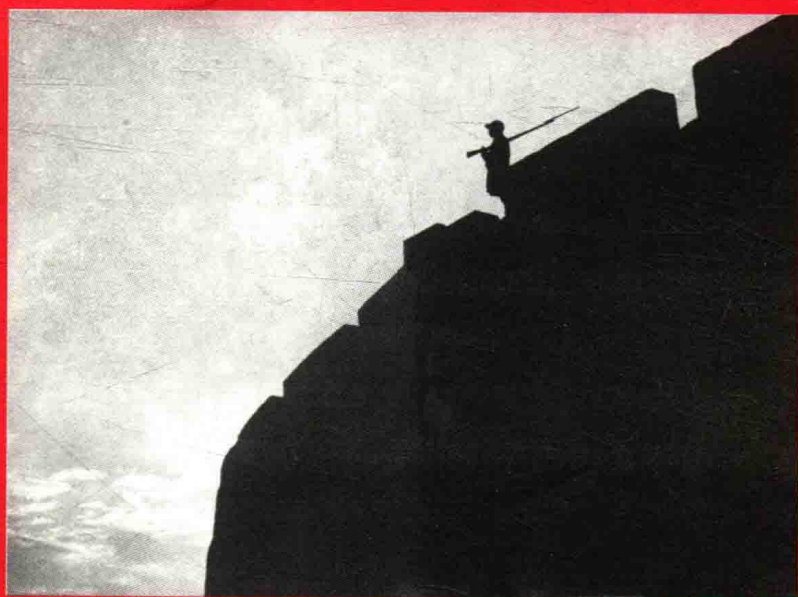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目 录

1	楔子
7	第一章 抗战前夜
35	第二章 开赴前线
73	第三章 论持久战
111	第四章 黄河大合唱
145	第五章 百团大战
197	第六章 皖南事变
227	第七章 南泥湾
269	第八章 整风运动
303	第九章 联合政府
339	第十章 抗战胜利
379	尾 声

楔子





毛泽东是1937年1月13日随中共中央进入延安的。1947年3月18日，他率中共中央撤离延安，一共在延安住了十年两个月零五天。这十年间，除了1945年到重庆去与蒋介石谈判，离开了一个月零十四天，其他时间一直在延安。

1927年8月7日“八七会议”时，当时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负责人瞿秋白征求毛泽东的意见，希望他去上海中央机关工作。毛泽东表示，不愿去大城市住高楼大厦，愿意到农村去，上山结交绿林朋友。（《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20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1月2版）

此后的十年，毛泽东一直在戎马倥偬中度过，有时甚至颠沛流离。那是大革命失败后国共两党内战的十年。1935年10月，结束长征的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进入陕北，但依然处于蒋介石派驻的中央军、东北军、西北军和地方军阀的重重围困之中，加之陕北人口稀少粮食缺乏，仍是谋生存的状态。直到西安事变后，蒋介石逐步放弃了“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治主张，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进驻延安，才进入发展壮大的阶段。

从1937年到1947年的“延安十年”，对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前八年，是抗日战争，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从开始的“和平谈判”，到后来再次内战，国民党被打败退踞台湾，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新中国。前八年，是艰苦的抗战，后两年，是走向新中国的转折点。

延安十年，毛泽东居然没有一首诗作。在长征路上，毛泽东诗作不断。进入陕北后，也写下了六言诗《给彭德怀同志》和《沁园春·雪》这样的传世名篇。而1947年3月离开延安后，毛泽东在转战陕北的路上又写起了诗，一直到建国后。为什么延安十年他不写诗呢？

1941年1月，远在苏联的毛岸英在致毛泽东的信中建议父亲写诗，毛泽东的

答复是：“我一点诗兴也没有，因此写不出。”（冯锡刚：《假作真时真亦假——毛泽东诗词真伪谈》，《同舟共进》杂志 2010 年 01 期）

不管是在江西苏区，还是长征路上，越是到艰险困厄之时，毛泽东越是诗兴勃发，诗情豪迈。而延安十年，毛泽东没有诗兴了。也许是居住地点固定了，每天面对相同的环境，难以激发出诗情。毛泽东的诗作是浪漫主义的，而延安十年的毛泽东，非常现实主义，为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发展壮大，为了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和建立新中国，最讲求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

长征前的 1934 年 10 月初，中共上海中央局负责苏区联络的电台被国民党破获，此后，莫斯科再也无法联系到中共中央。直到 1935 年 11 月中旬，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的张浩（即林育英）秘密潜回中国，到达陕北苏区，中共中央才与共产国际重新接上头。而直到 1936 年 6 月 16 日，中共中央才利用自己新建的电台，从陕北向共产国际首次发出电报。（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325 页，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0 年 5 月 1 版）

1935 年 1 月 15 日至 17 日的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历史转折点。那次会议结束了博古（即秦邦宪）、李德的错误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在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挽救了党和红军。遵义会议，恰恰是在得不到共产国际指示的情况下召开的。未经共产国际同意，就解除了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军事顾问李德对红军的军事指挥权，是中国共产党迫于当时严峻的军事形势、总结了“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后做出的决定。

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当选为政治局常委，但推选张闻天（即洛甫）在中央“负总责”，而在“党内委托的对于军事指挥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是周恩来，毛泽东成为三人军事指挥小组（周恩来、王稼祥、毛泽东）的成员之一，协助周恩来指挥军事。

在长征路上，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才能得到极大发挥，大家渐渐公认“老毛会打仗”，使他实际上成为红军的最高军事指挥者。在西安事变爆发前几天的 1936 年 12 月 7 日，毛泽东当选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正式成为党内最高军事领导人。

1935年7月25日至8月20日，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了第七次代表大会，这也是共产国际的最后一次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中国代表有王明（即陈绍禹）、康生、吴玉章、林育英（即张浩）和孔原等人。这次大会选举王明、毛泽东、张国焘、周恩来为共产国际执委，表明了共产国际对遵义会议后毛泽东领导地位的承认，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对毛泽东正确路线的肯定。

因为没有电台通信，共产国际是在遵义会议后离开红军长征队伍、肩负与共产国际取得联系重任的陈云、潘汉年等人到达莫斯科后，听汇报后才知道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的情况的。听取了陈云、潘汉年的汇报后，共产国际将毛泽东列入中共最高领导人之一。而共产国际对毛泽东的这一任命，直到11月下旬，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代表阎红彦辗转外蒙古等地，后来到陕北，才将这一信息传递给了刚到陕北的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汪金国：《反法西斯战争时期的中国与世界研究（第八卷）·战时苏联对华政策》161页，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1月1版）

到达陕北后，成为中共最高军事指挥者和共产国际执委，表明毛泽东在党内的领袖地位开始得到确认。而他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则是在延安时期。

在1938年9月29日到11月6日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主持中央书记处日常工作，在中央书记处五位书记的排名上首次列为第一位，是他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领袖的第一个标志。毛泽东后来评述六届六中全会为“第二次遵义会议”。（张希贤：《毛泽东在延安》48页，警官教育出版社1993年3月1版）

1943年3月20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毛泽东被推选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是他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领袖的第二个标志。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主席，“毛泽东思想”被写入党章，正式宣告他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

这三次重要的会议，都是在延安召开的。

1945年，也是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一年。“七大”闭幕两个月后，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抗战八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敌后抗日武装，在抵抗日寇侵略上起到了什么作用？抗战八年，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坚持了什么样的

抗战路线？国民党领导着正面抗日战场，共产党领导着敌后抗日战场，国共两党之间，主流是团结合作的，却又发生过许多摩擦。国共两党后面，是苏美英等同盟国之间对中国抗战的不同利益诉求和观念的合作与分歧，共同编织成英勇壮烈、激荡恢弘的历史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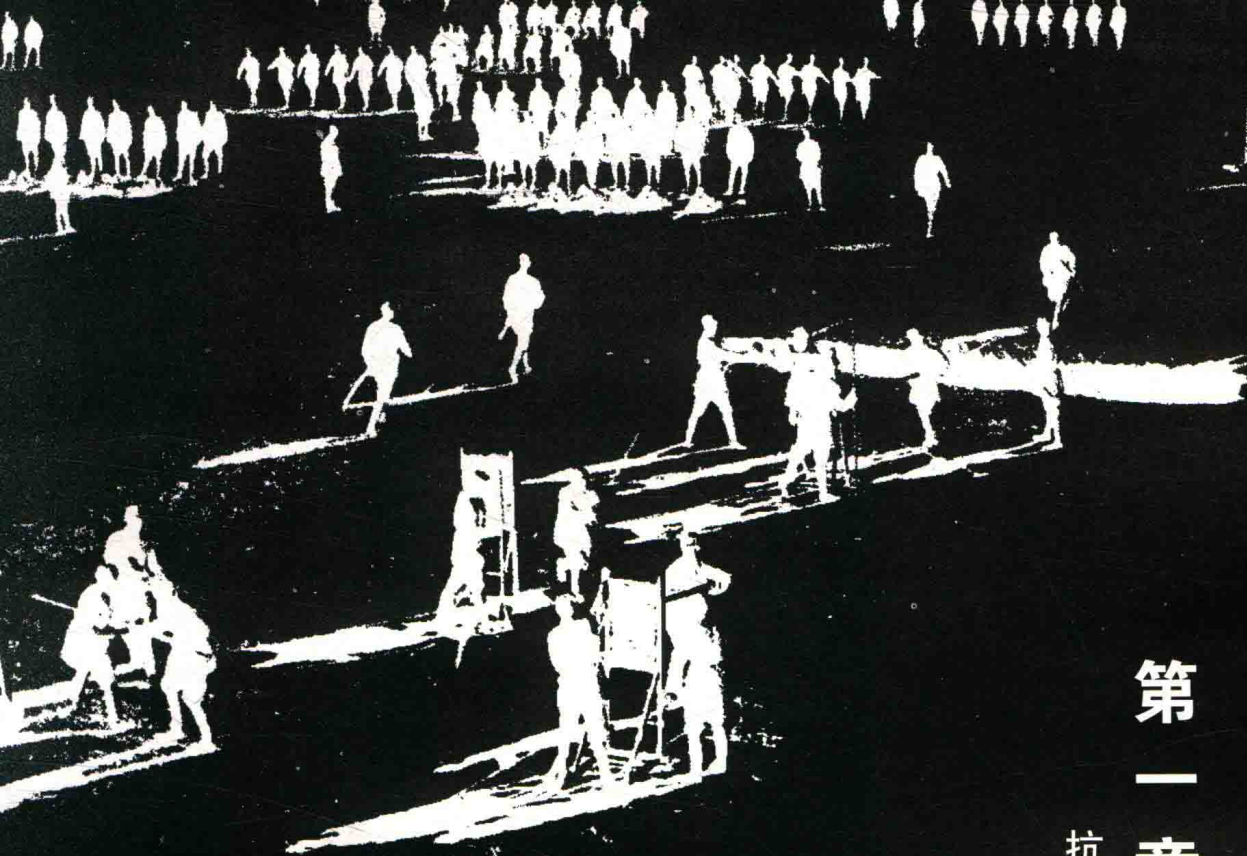
在八年抗战中，中日双方共投入总兵力四百余万，战线长达一千八百多公里，中国军队抗击着日军陆军主力，制约着日本的“北进”和“南进”，保障了同盟国“先欧后亚”的大战略。

美国总统罗斯福说：“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坍了，你想想有多少师团的日本兵可以因此调到其他方面来作战？……日本可以和德国配合起来，举行一个大规模的夹攻，在近东会师，把俄国完全隔离起来，割吞埃及，斩断通过地中海的一切交通线。”

苏联元帅崔可夫说：“在我们最艰苦的战争年代里日本也没有进攻苏联，却把中国淹没在血泊中，稍微尊重客观事实的人都不能不考虑到这一明显而无可争辩的事实。”（《中国抗日战争史》15页，人民出版社2011年9月1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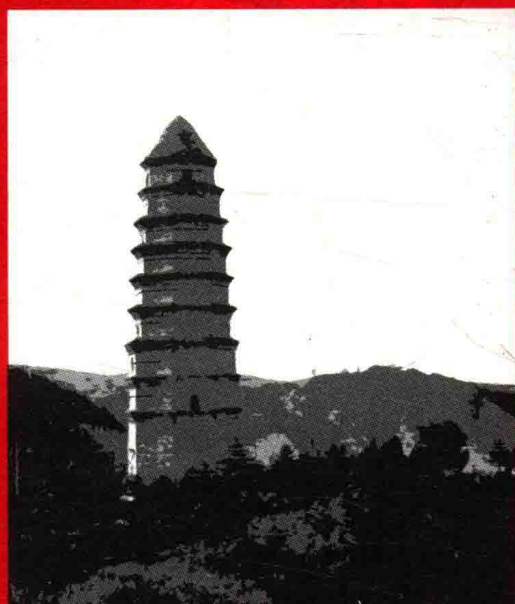
在血与火的抗日战场上浴血奋战、运筹帷幄，在刀光剑影的国内国际政治舞台上纵横捭阖、谈笑间檣櫓灰飞烟灭，中国共产党、中共军队和毛泽东的政治智慧、军事韬略和哲学思想，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为后来夺取政权、建设新中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本书将为您展开的，就是这样一幅气势恢宏、纵横激荡的历史画卷，而中国摄影家协会前主席徐肖冰在抗日战争期间拍摄的大量珍贵历史图片，正是这幅画卷的一个个精彩画面。徐肖冰说，我是在摄影机后面观察历史的人……



第一章

抗战前夜



1937年1月10日，毛泽东从陕西保安（今志丹县）出发，随中共中央机关前往延安。离开保安时，女儿李敏（这个名字是1947年随母亲贺子珍从苏联回国后起的，出生时由邓颖超给起了个小名“娇娇”，一般都叫她“毛娇娇”）刚出生不久，还未满月。毛泽东将襁褓中的女儿抱在怀里，亲着孩子娇嫩的脸蛋，高兴地说：“我的娇娃，你赶上好时光哩，我们就要到城里住呢。”（《叶子龙回忆录》4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10月1版）

延安坐落在凤凰山和宝塔山之间的一块平原上，延河沿着两座山的北面拐了个小弯向东流去，南川河则从两座山之间汇入延河，清凉山在延河的北面。三山夹两河，是延安的基本地形。

西安事变前，延安被东北军占据。西安事变后，东北军、西北军与红军结成“三位一体”的军事同盟，原来在延安的东北军撤向西安一带集中，以便对付国民党中央军的进攻。留守延安的国民党地方民团在中共陕北地下党的工作下，准备迎接红军进城。1936年12月18日，也就是西安事变六天后，红军前敌总指挥彭德怀命令红一军团总指挥罗斌带一个团进入延安，没动什么干戈，比较顺利地延安城楼挂起了红色苏维埃的旗帜。

1937年1月13日，毛泽东进入延安，受到了延安各界的热烈欢迎，有机关干部、学生、战士和市民一万多人，从大砭沟口到城北门，排了几里路。毛泽东与市民代表们一一握手。有一位代表牵着一匹高大的骡子请毛泽东乘骑，毛泽东表示谢意，但没有骑，而是踏着封冻的冰面步行过了延河。他身穿灰土布衣，头戴八角帽，走到哪里哪里就发出热烈的欢呼声。

延安宝塔山上的宝塔是明代所建，塔旁有一口明代的大钟，中共中央在延安时曾用它来报警和报时。秦代，始皇帝派蒙恬在秦都的北大门修筑长城，退却匈奴入

侵之敌达七百里。宝塔山上还有宋代修建的城池和鹿寨，范仲淹题刻的“嘉岭山”三个大字，告诉人们这里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隋唐时，这里有盖吴灭胡起义、花木兰代父从军、刘迦伦起义。南北朝时，陕北人为了抗击北方部落赫连勃勃入侵中原，在黄陵县境内筑起了“统万城”，如今只剩下残砖断瓦。明代，陕北出了个“闯王”李自成，南征北战十几年，最后打进了紫禁城，一箭射在了午门的匾额上……

同保安相比，延安在陕北算是大城市。坚固的城墙顺着山脊蜿蜒而上，越过一道道山梁。除了山根的窑洞，城里有相当漂亮的房屋和院落。那些最宽敞最漂亮的院落，红军到来前都已经空空无人，有钱人认为共产党“共产共妻”，早跑到乡下或西安去了。延安大约有居民三四千人。在露天的集市上，农民和商贩还有少量的猪肉、蛋类及其它食品出售。还有一些小商店、小饭馆和旅馆，在照常营业。

除安顿徐特立这样的老人和李德、马海德这样的外国友人住在城里之外，毛泽东、朱德等都住在凤凰山根的窑洞里。张国焘选择了不城不窑的民居，各机关选择了适合自己的聚居地。一夜之间，延安成了红色中国的首都。

毛泽东到延安后，住处换过几次，最初是住在凤凰山下姓李的老家。这是五孔见方平顶的窑洞，洞前横砌着一道黄土墙，使得窑洞成天见不到太阳，阴暗潮湿。虽然生了一盆炭火，但无济于事，毛泽东平时睡惯了炕，这个窑洞里偏偏没有炕，只得架了一张床。每天起床时，被子潮乎乎的。

到1937年夏天，住了半年的毛泽东得了风湿病，右胳膊疼得抬不起来，连写字都困难，他又得天天伏案写作，痛苦不堪。毛泽东不爱看医生，这次疼得实在受不了，让他的秘书叶子龙去请中央军委卫生部长姜齐贤来诊治。姜齐贤来后，告诉毛泽东，这种病是由于长期住在潮湿的房间造成的，换一换环境，结合治疗，慢慢会好的。毛泽东皱着眉头气恼地说：“我就不信，我毛泽东非得住高楼大厦不行。干什么嘛，连胳膊都治不好，撤职！”

一直到1937年8月底开完洛川会议回来，毛泽东还住在李家窑洞，风湿病越来越重。叶子龙急了，到处寻访，看中了坡下不远张国焘住的吴家大院。这是一座宽敞的四孔窑洞，屋檐宽大，为了防潮，还用石板铺了地基。叶子龙请张国焘搬了出去，让毛泽东住了进来。毛泽东在吴家大院住了一年多，胳膊渐渐好转。（《叶子

1937年1月中旬，“中国抗日红军大学”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中革军委主席毛泽东兼任抗大教育委员会主席。21日，毛泽东出席了抗大举行的开学典礼，并发表讲话。抗大和随后成立的陕北公学、延安女子大学、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等，都成为培养革命干部的延安的“黄埔军校”。毛泽东对这些学校的教育非常关心，时常来演讲，还亲自担任教员，讲授课程，后来收入《毛泽东选集》的许多篇章，都在学校讲演过，甚至最初就是教材。在抗大的开学典礼上，毛泽东说：抗大像一块磨刀石，把那些小资产阶级意识——感情冲动、粗暴浮躁、没有耐心等磨个精光，把自己变成一把雪亮的利刃，去打倒日本，去创造新社会。（《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64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1版）

1月30日，毛泽东致信徐特立，祝贺他的六十岁寿辰。徐特立比毛泽东大十六岁，是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的老师。信中说：“你是我二十年前的先生，你现在仍然是我的先生，你将来必定还是我的先生。当革命失败的时候，许多共产党员离开了共产党，有些甚至跑到敌人那边去了，你却在一九二七年秋天加入共产党，而且取的态度是十分积极的。”他赞颂了徐特立的品质，“你是心里想的就是口里说的与手里做的，而在有些人他们心之某一角落，却不免藏着一些腌腌臢臢的东西。”“你是处处表现自己就是服从党的与革命的纪律之模范，而在有些人却似乎认为纪律只是束缚人家的，自己并不包括在内。”信的结尾，毛泽东祝徐特立健康长寿，成为一切革命党人与全体人民的模范。

也是在这一天，毛泽东致信李克农，请他购买整个中国历史演义两部。自从来到陕北后，毛泽东不像长征途中那样忙于军事指挥，可以抽点时间读书学习。但陕北地处偏僻，收集书报不易，所以毛泽东广泛收罗，下了很大功夫。

毛泽东少年时读过六年的私塾，学过《三字经》、《幼学琼林》和四书五经等儒家经书，也喜欢读《精忠传》、《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封神榜》等古典小说。1910年，一个叫李漱清的维新派教师从外地回到韶山，给十七岁的毛泽东带来郑观应的《盛世危言》，这是毛泽东读到的第一本包含新思想的书。

那年秋天，他离开韶山，到湘乡东山小学堂读书，接受新式教育，开始接触自然科学和地理、英语等科目，也才知道慈禧太后已经死了，新皇帝即位都两年了。他读了表兄文运昌借给他的一套《新民丛报》合订本，康有为、梁启超成为他崇拜的人物。同学萧子璋（即萧三）借给他一本《世界英雄豪杰传》，他被华盛顿、林肯、拿破仑、彼得大帝等历史人物的事迹深深感染，作了大量的标注和眉批。

1911年，毛泽东来到省城长沙，就读湘乡驻省中学。读到革命派办的《民立报》，思想受到巨大冲击，曾将自己的一篇文章贴在墙上，表示支持国民党推翻清朝，建立民国，提出请孙中山回来当大总统，康有为做内阁总理，梁启超做外交部部长。十月十日武昌起义爆发，毛泽东投革命军当了半年兵，当兵期间从《湘汉新闻》上第一次看到了“社会主义”这个词，但并非后来社会根本制度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而只是由社会名流江亢虎组织的中国社会党鼓吹的社会改良主义。后来，他退伍，考入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读了同学柳潜借给他的《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学习了半年后，感觉校规刻板，课程有限，就退学自修。住在湘乡会馆，每天步行三里路到浏阳门外定王台的湖南省立图书馆自学。

在湖南图书馆，毛泽东读了西方十八、十九世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近代科学的书，如卢梭《民约论》、达尔文《物种起源》，特别是严复翻译的书，如亚当·斯密的《原富》、孟德斯鸠的《法意》、赫胥黎的《天演论》、斯宾塞的《群学肆言》等，受到西方近代启蒙思想教育。当他第一次看到图书馆墙上悬挂着的一张世界大地图时，非常震惊，才知道世界原来是多么大，中国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湘潭县在地图上根本没有。（《毛泽东传（1893—1949）》1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1版）

1913年春，毛泽东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第二年春，第四师范合并到第一师范。在第一师范，毛泽东结识了杨昌济、徐特立、王季范、黎锦熙等一批学识渊博、思想进步的教师，也与蔡和森、周世钊、李维汉、萧子璋、何叔衡等人成为同学。在一师期间，毛泽东阅读了从先秦诸子到明清时代的思想家著作，阅读了从二十四史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从《昭明文选》到《韩昌黎全集》，从《读史方輿纪要》到本省县志等大量书籍。

1915年秋，二十二岁的毛泽东读到了陈独秀刚刚创办的《青年杂志》（一年后

改名《新青年》)，受到新文化运动的启蒙，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对西方哲学、伦理学发生浓厚兴趣，在德国康德派哲学家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一书上写了一万二千字的批语。

1918年8月，毛泽东和萧子升、张昆弟、李维汉、罗章龙等二十四名青年从长沙进北京，组织赴法勤工俭学。10月，经杨昌济介绍，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当助理员，图书馆主任是李大钊。在北大图书馆，毛泽东阅读各种新出书刊，在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影响下，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阅读了《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史》等书籍。1918年11月，他到天安门广场亲耳听了李大钊《庶民的胜利》的演讲。

这就是毛泽东青少年时代的读书活动。参加革命后，他非常喜欢阅读书报，在戎马倥偬的战争岁月，每到一地就会到处搜罗书籍报刊，不断从书报中汲取知识营养。红军进入陕北后，毛泽东更是进入了读书思考的新时期，在哲学、军事学、新民主主义理论、党的历史问题上发起了一轮又一轮的理论攻势，直到1941年5月后开展的延安整风运动，更是掀起了高潮。他后来回忆说：“在延安，书读了不少，也写了几篇像点样子的文章，许多事情搞清楚了。”（《叶子龙回忆录》4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10月1版）

1936年6月至10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到陕北苏区访问，多次在保安采访毛泽东，后来写出震惊中外的传世名著《西行漫记》。有一次斯诺夜访毛泽东，有人带几本新哲学书来，毛泽东当下要求斯诺改期再谈，而花三四夜专心攻读那几本书了。“他读书的范围不仅限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而且也读过一些古希腊哲学家、斯宾诺莎、康德、歌德、黑格尔、卢梭等人的著作。”（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67—68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12月版）

1936年10月22日，毛泽东致函在西安做统战工作的叶剑英、刘鼎，让他们“买一批通俗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及哲学书，大约共买十种至十五种左右，要经过选择真正是通俗的而又有价值的（例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柳湜的《街头讲话》之类），每种买五十种”。“买来的军事书多不合用，多是战术技术的，我们要的是战役指挥与战略的，按照此标准选买若干。买一部《孙子兵法》来。”他后来多次讲到：在